

第五节 家谱研究历史远 学术价值世认同

一、何谓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家谱。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方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史是钦定的国史，是专门记载朝政方略、治国安邦、保家惠民的重要文献。方志是地方史籍，是记载一方水土及人文、经济、地理的史料。家谱是家乘手卷，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性形式记载本氏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它记载着本族人的肇基、渊源及世代繁衍生息、族规家训、风土人情、族内重大事件等。家谱是来自民间的第一手材料，更具有基础性质。它涉及历史、人口、经济、人类、遗传等学科，是研究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它用独特的方式反映着一个群体，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

二、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佚，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牒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牒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此后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

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到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它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广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颉刚^[2]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珣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河。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谭其骧^[3],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新中国建立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4]、罗香林^[5]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20世纪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新中国建立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下，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家谱被当作四旧遭到清理，“成千上万”的家谱被毁，很多中国人不得不毁掉家族世代珍藏的家谱，这对于研究中国人的人文历史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新中国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新中国建立初期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谱牒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三、家谱研究的学术成果

当前，家谱学术研究呈现出如旭日东升、方兴未艾之势。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潜心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20世纪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180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

2000年6月6-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在北京主办中文文献资料世建共享合作会议，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艾青出席了开幕式并讲了话。会议的主旨是促进全球

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确定各中文图书馆的合作方式方法、建立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共享体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学者在会上提出了多项合作计划，与会代表对这些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最后，会议将《古籍联合目录资料库》、《中文名称规范数据库》、《孙中山数字图书馆》、《中国拓片数据库》、《中国家谱总目》等八个项目正式立项。



中国家谱总目

《中国家谱总目》正式立项之后，由上海图书馆作为牵头、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通力合作，经过九年的刻苦钻研，辛勤耕耘，艰辛努力，于2009年7月14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如图）。深栗色封面、古朴庄重的《中国家谱总目》全书1200万字、共10册，共计收录了中国家谱52401种、计608个姓氏，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家谱最多、著录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专题性联合目录，较完整地揭示了海内外各地区收藏的中国58个民族姓氏家谱的基本情况和存世的中国家谱姓氏状况。

《中国家谱总目》在长达九年的编纂过程中，得到海内外近600家中国家谱收藏单位、数以千计的私人家谱收藏者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副主编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以及各编委单位的通力合作。《中国家谱总目》主编王鹤鸣研究员在上海图书馆2009年7月14日举行的首发式上不胜感慨地说：“大家都是怀着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参与、共同协作、无私奉献，才使这部煌煌巨著得以问世。”专程来沪的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主席沙其敏表示，《中国家谱总目》的正式出版是中国目录史上一件大事，《中国家谱总目》所汇集的巨大家谱数据量，为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慎终追远提供了非常详细的线索。

“《中国家谱总目》的出版，还为学术界开发利用家谱资源提供了一份详细的‘矿

藏分布图’。”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说，“家谱中保存了大量的人物、经济、移民、文化、民俗、教育、人口等资料，对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民俗学、人口学、遗传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均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统计表明，上海是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地区，共 18000 种；其次是台湾和北京地区，分别为 10234 种和 8102 种。在国外，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以及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均有中国家谱的收藏。

2. 家谱研究的曲折历程。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肇端、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牒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牒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敢为人先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着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 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 1996 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肇端、起源、演变、分支、迁徙、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四、家谱的研究价值

中国家谱，于今人又什么价值？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存留至今的家谱疑信相渗、精华与糟粕同在的现状来看，家谱对今人具有以下两方面价值：

1. 家谱的历史价值。作为家族繁衍、活动档案材料的家谱，保存了历代不同地区与世系活动相关的丰富资料，它对于相关学科，诸如社会史、移民史、人口史、地方史……等都具有史料价值，这已为众多的有识之士所论证。几十年前，史学大师顾颉刚认为：“我国史籍之富，举世无比。然列入公认的官修正史，由于种种原因，自今论之，尚难允称‘信史’。今青年治史学，当于二十五史外博求史料，取精用宏、成就当非前代所可比。而今我国史学领域有尚待开发的二个‘大金矿’，即地方志和族谱。它一向为治史者所忽视，实则其中蕴藏无尽有价值的史料，为‘正史’所难于悉纪而不为人所知者”。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忽视”状况现在已有改变，重视家谱史料价值的学者已日渐增多，见诸文字者不少，勿庸赘述。作为史料价值，要在求真求实。尽管家谱修撰早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循实记载”、“置诸阙疑”等主张，但是，出于种种家族利益的考虑和显耀门庭的诱惑，谱牒学界的伪俗之风在每一朝代都存在，因此，用家谱史料，必须严格甄别真伪，不可全信全疑。

2. 家谱的文化价值。家谱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历史悠久。在历史的长河中，家谱已经形成有独特内涵、浸润着民族情愫的谱牒文化，它对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重大影响。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中华民族就是在自己独特的环境中，经过几千年的蕴酿由众多族源融合、自然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伟大民族。相对独立共同生活的地理生态系统，漫漫历史长河的共同创造，彼此密切交往交流，不断分化和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产生了散发千枝归一本，宗朝万代实同源的民族凝聚力。

今天炎黄子孙已经走向世界，遍布五大洲 168 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人已经超过 5500 万。“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夫的旗帜上写着中华。”尽管他们之中已有不少人入籍于所在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认同、政治认同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据统计：1996 年世界共有华人社团 9255 个，（世界性的华人社团就已超过 70 个）其中属于亲缘性的宗亲社团占了 34%，有 3147 个。海外宗亲社团是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凝聚的产物，他们有强烈寻根的愿望。每当我们看到，一年一度，人们远涉重洋，不远万里，沓麻于沮水之滨、桥山之颠的华夏始祖轩辕黄帝陵前，共告“五洲风雨疾，华夏有炎黄”，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情感。台湾有一位研究神农文化的学者叫姜竹^[6]，他说：“台湾同胞是非常崇拜炎帝的，那边的炎帝神农庙有 121 座，每年神农圣诞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日）总要进行一次祭祀活动，以表达

炎帝子孙的爱国之心。目前，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都有烈山宗亲会，这样，在海内、海外、香港、台湾，炎黄两帝已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文化纽带了”。炎黄共祖的文化认同，是以姓氏溯源的谱系为根据的，古老的《世本》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启其端，历代的姓氏谱系扬其波，它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成了民族集体的潜意识，这正是谱牒文化所发挥的作用。家谱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应该着重考察谱牒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现象、规律、社会影响和作用。谱牒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全用史料价值的标准来要求它。比如攀援历史名人为始祖的现象，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考察是不可取的，但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考察，它又往往起了名人效应，凝聚、鼓舞、鞭策族群的作用。又如同宗共祖问题，从历史的真实看，任何一个姓氏，其来源都十分复杂，历代改姓、赐姓、冒姓层出不穷，欲求血缘的绝对纯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作为已形成的文化认同是不可深究和苛求的。所以今天的谱牒学，既要重视历史价值的开掘，又要重视文化价值的开发。我们在实际运用中，更要注意发挥家谱在凝聚社会群体，增强民族凝聚力，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和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

从科学角度分析，每一部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蕴藏这个家族很多独一无二的经济文化生活资料，是历史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教育学的丰富史料来源。

总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为祖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也为姓氏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进一步研究和把握祖国文化改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振奋精神，开拓创新，自我超越，扎实工作，为姓氏文化研究添砖加瓦，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2]顾颉刚(1893-1980)，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

[3]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笔名禾子，浙江嘉兴嘉善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新中国成立前，先后任教于辅仁、北京、燕京、清华、浙江、暨南等大学。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2-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4]潘光旦(1899-1967)，中国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淞中国公学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讲授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等课程。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

[5]罗香林(1906-1978)，客家学大师。字元一，号乙堂。1926年夏从上海政治大学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兼修社会人类学。1930年夏，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升母校研究院，专治唐史与百越源流问题，兼肄业燕京大学研究院。1936年任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山大学副教授，讲授史学，与馆中同仁创办《广州学报》季刊与《书林》半月刊。1949年全家移居香港。被学术界誉为客家总问题专家。

[6]姜竹，1918年出生，浙江省余姚市人，台北市姜氏宗亲常务理事兼会讯主编。曾在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美尔顿英文学院毕业及美国陆军输管制班培训，任教官组长，后以陆军运输兵俸上校退役。历经32年创编《炎帝神农世系姓氏次序图》、《炎帝神农姜姓诸氏渊源顺序考》及《姜姓始祖炎帝神农传承157代世系表》三种史料，1991年赠书湖北随州历山“炎帝神农故里”，遂聘其为顾问，并立碑纪念。其事迹曾被登入《世界名人录》等大型人物辞书。